

『三农』问题 与制度变迁

温铁军◎著

Rural Issues &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走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握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群体经济学家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

五
十
人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三农』问题 与制度变迁

温铁军◎著

(第二版)

铁
军
经
济
学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温铁军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17 - 8673 - 2

I. 三… II. 温…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F32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27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 乔卫兵 吴航斌 (Email: hangbinwu@126.com)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9.75 字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673 - 2/F · 7651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 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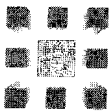
总 序

为了向社会各界反映论坛成员的重要成果,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组织者决定出版一套丛书,为愿意出版自己学术研究成果的成员提供服务。大家推荐我为这套丛书写序,能享有这种殊荣,我感到非常高兴。说明每一位论坛成员的学术背景和每一本书的详细内容,不是我在这里想做的,坦率地说,我也不具备这种资格和能力。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50人论坛是怎么成立的,有什么特点,这些年主要进行了哪些领域的讨论和研究。希望通过这样的介绍,使读者对这套丛书的背景有一个总体了解。



记得是在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吴敬琏老师和易纲老师的认同,大家共同倡议,组织一个非正式论坛。把这个论坛称为“50人论坛”是樊纲的主意,认为这个名称比较符合国际惯例,也可以体现论坛的包容性。当然,实际参加人数并不受50人的限制。不久,论坛就成立了。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50人论坛已经成为中国部分经济学家们讨论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一个重要场合,它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而且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政府主要综合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经常倾听论坛的意见,或者委托论坛展开讨论。不少领导也以不同方式,认真听



取 50 人论坛对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

二

从 50 人论坛的学者名单中不难发现,这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是一批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知名度、被新闻媒体追逐的学者,也是一批极有个性和创见的学者。读者可能要问,什么样的力量能使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并且持续发展?中国各种各样的论坛很多,相当多的论坛具有自发性,但经过很短的繁荣期之后,往往就消失了。为什么 50 人论坛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的体会,支撑的是三个基本因素。一个是超前性研究的学术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支撑论坛存在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学的需求导向原理。每个成员都需要进行学术交流,都需要进行讨论和辩论,这种讨论和辩论又必须是在同一层面的,论坛恰恰可以满足这种学术需要。第二个是讲真话的学术作风。在讨论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和讲真话,论坛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和内外有别的要求,力求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第三个是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论坛的成员有的是职业学者,有的是学者型的政府官员,在论坛内部大家一律平等,发言的时间和顺序与本人的职务没有关系。不能参加某次讨论的学者要请假,没有特殊性和特权。这种空气反映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正是这样的组织文化下,大家可以自由讨论问题。记得在 2003 年 5 月,当非典疫情仍在全社会心理上造成较大威胁的时候,50 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讨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当时,论坛的组织者在颐和园租了一条龙船,在昆明湖上讨论和总结非典带来的宝贵经验。我没有详细考证过,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但起码近几年在中国没有出现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论坛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三

在论坛成立的几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矛盾和前沿问题,论坛展开了多次讨论。根据档案记录,各种类型的内部专题研讨会召开了 25 次,公开的讨论 80 多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主题鲜明、规模较大的论坛年会。在众多的讨论中,使大家兴奋的题目实际有六个领域。我很难用较短的篇幅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全部讲清

楚。实际上,即便有充足的篇幅,我也难以讲清楚。在这里,只能简要介绍使论坛成员们兴奋的一些重要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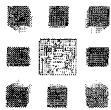
中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近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通缩到通胀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客观性不容置疑,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这是大国经济增长的普遍现象。使论坛成员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周期阶段发生变化是哪些主要力量推动的,哪些因素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如何区分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对经济周期的不同影响,周期的下一个拐点可能什么时候出现,怎样预测新周期阶段的特征,需要警觉哪些主要风险。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和路径选择。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是人均收入提高的函数,这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什么中国的人口、土地、水和社会制度约束,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完全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路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上,中国怎样以更开放的方式形成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怎样避免简单追随刘易斯模式,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形成内生性增长动力。在消除区域增长的差别上,怎样在非均衡增长和均衡增长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点。

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中国渐进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战略制高点是政府与市场角色的准确定位。对政府改革来说,怎样形成基本的动力机制推动这项改革,需要形成什么样的治理框架,怎样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如何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方面,怎样打破垄断和分割的利益格局制约,怎样纠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竞争不充分所引起的市场机制失灵,怎样创造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制度条件。

未来中国经济的国际角色。在不知不觉之间,中国走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巨大的国内市场、超大规模国家的竞争优势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全球的瞩目。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中国的汇率和利率变化,也引起从未有过的国际关注。未来怎样界定中国经济扮演的国际角色,怎样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解决重要资源的供给问题,国内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怎样适应已经进入全球分工领域的生产力发展要求。

经济与社会协调。近年来,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兼顾收入分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怎样壮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怎样解决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起步并且不断深入。正在和继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处于人均1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大国,解决社



会问题的基调和社会管理机制如何界定,用什么样的矛盾缓冲机制克服凸显的社会矛盾,最终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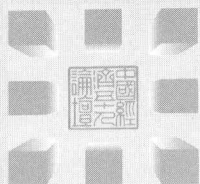
已经讨论和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鲜明地勾画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脉络。如果抓住这六个基本线索,理解其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可以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当然,围绕这些问题的实践和学术研究还在继续,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观点也有相当局限性,但无论如何,这些线索和讨论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这个简短序言结束之前,我还想强调一下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单问题。记得在2000年的6月份,国内舆论普遍关注国有企业改革。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们意识到,推动政府改革是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环节,是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前提。论坛决定,在古城西安讨论新形势下推动政府改革。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不无感慨地说,西安是中国统一后的第一个古都,当时的中央政府就在这里。2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国政府对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改革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继续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50人论坛成员的著作,是他们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得益于大家的相互交流。我由衷希望,这些著作能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变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刘鹤

2005年4月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第二版自序

中国与世界的“三农”问题^①

Rural Issues &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① 中国20世纪的领导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曾经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后来，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中国如果出问题，就出在农业上。自从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问题尖锐、农民负担加重导致上访告状和社会事件大幅度增加以来（90年代末超过万起），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原来并不是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

Rural Issues &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题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引言：为什么出第二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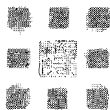
确实，我在1999年本书第一版截稿时的心态，只不过是“立此存照”，抱定的是冥顽不灵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本书主义”。

也许因为，当时我的情况很尴尬的。

一方面，我凭着在政策研究单位工作多年的经验教训，早在90年代中期已感到自己在农村试验区的工作中过于迂腐地坚持了科学试验必须不断“证伪”的原则，而这在潜规则起作用的一般官场生态环境中就意味着“报忧得忧”。于是，到1998年夏天上级正式通知我必须服从工作岗位调整。由此，正式终止了我已经从事了11年的农村政策试验工作^①。

另一方面，在90年代末期到中国农业大学的“回炉学习”之中，我也或多或少地知道了自己从农村实践之中提炼出的观点与学术理论界通行的理论相悖。其中最令我有感觉的是1999年我的博士论文终于被允许进行答辩的时候，以我国农经理论界最年长的权威安希佶教授担任主任的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答辩委员会给我的评价有惊无险——“你的论文提出的观点，对于现行农经理论是颠覆性的！不过，由于你在论文中

^① 我于1993年发表在《经济日报》的文章《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外——一个农村调查员的手记》，就提出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宏观政策造成的，不能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农业出了问题；1995年写出《关于农业与农村政策不同意见的分析》；1996年正式发表以“三农”问题为标题的文章。随后的1997年10月，我又主持了一次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名义召开的关于乡镇企业改制与股权流动方面的研讨会，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的论述自成逻辑，本委员会仍然允许你通过；并建议申报为优秀论文”^①。我至今深深感激老一辈学者们宽广的胸怀，如果以我后来经历的复杂情况看，同辈和晚辈中那些习惯于“意识形态化”地讨论问题却不自知的学者，碍难再现老一辈那种海纳百川的大度与宽容^②。

第一版付梓时的我，依然愚钝；但哪怕我再混沌不灵，也分明知道，依据我国农村基层试验总结形成论文、进一步扩展而成的这本书的主要思想，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是可能被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都排斥的，而且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背后通行的西方一元论的科学哲学。因此，第一版初稿修改时，我便特意地把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叙述放在脚注里。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确实没有西方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学历。在很多农业经济学家约定俗成的理论领域中我是门外汉；只能不断加强学习。以这种从来没有西方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正规学历的门外汉的身份写农村发展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的学术著作，当然心虚得很。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自己得到的各种荣誉其实不过浪得虚名，也从来不敢认为自己所提出的这些粗浅的理论探讨是够得上规范研究层次的。

因此，第一版签约之前当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这样的纯学术著作只能印刷 3000 册的时候，我内心竟然窃喜——生怕印数太多、谬种误传会引起更多麻烦^③。

后来，第一版发行不久，没想到竟然连出版社书库留存的底子都卖光了，便有人要出第二版；我则仍然心有余悸，虚与委蛇地说：物以稀

^① 担任我论文指导教授的还有我的老领导、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除农经理论界前辈安希俊先生之外，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谭向勇教授、研究生院院长赵冬缓教授、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秀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严瑞珍教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局朱泽研究员等，大多是农经领域的权威学者。至于去农大读书的原因，则是由于很早就意识到 80 年代末期以后的问题其实越来越明显地属于方针路线之变，我这种不愿意明知故犯的人可能会遇到麻烦，因此需要给自己留“后路”——不能在政府部门做政策研究，那就去从事学术研究——遂于 1995 年 9 月起师从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的俞家宝教授攻读在职研究生，1998 年完成学分，1999 年完成论文。我能够在职“硕博连读”，还要特别感谢为此力排众议的研究生院赵冬缓院长。

^② 参见《天涯》杂志 2005 年初发表的“农村版祭”。那是我离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之后写的。此外，我于 2004 年暑假之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原农经系改建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担任院长之后，也有机会继续了解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动作。

^③ 当时的责任编辑是现任中国经济出版社副总编的官水久先生，是他同意我不交任何费用出版此书的第一版；在此表示特别致谢。

为贵嘛，要读的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找来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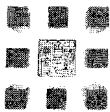
再后来，据说有些学生要到北京图书馆去花钱复印，这的确是个令人不安的事情，因为我这时已经到学校以教书为生。后来“知识产权出版社”也来找我协商，要求作为“绝版书”增加些印数，以便补充各个图书馆的馆藏书之需；我这才犹犹豫豫地答应出第二版。

答应改写出第二版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在1987年就已经作为自己从事农村试验区工作指导思想^①、并于1995年正式以公开发表文章形式提出的“三农”问题，从20世纪末被官方写入正式文件，到新世纪之初不期然竟会被社会广泛接受。我在2001年开始倡导以民间之微薄却艰苦尝试的“新乡村建设”试验，也从一度被人多所诟病的“乌托邦空想”，演变为各地新农村建设可资借鉴的现实经验。国家领导人还在2005年明确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和“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新战略思想。总之，让我感到尴尬的、曾经在90年代盛行并且贻害匪浅的照搬、照抄，也许真的将有可能成为明日黄花？！

在中国学术界，过去我曾经或主动或被动地“自我放逐”，心甘情愿地、甚至笑容可掬地自称为“另类学者”（Alternative Scholar）。这在我，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对中国农村制度百年变迁的描述和解释，确实不仅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同，也与一般的农业经济学理论不同——尽管各方面没有对错之分。而另一方面，近些年来我又逐渐被学术界很多人所接受并且形成一定影响，这也许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9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问题日益复杂严峻，照搬过来的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农村的现实问题，人们才注意讨论我过去在基层调查中提出、并且长期在农村试验中坚持的观点。

其实，与中国农村改革有关的理论界人士大多知道，我们十多年来在各地试验区身体力行的，本来是按照新古典的基本理论追求市场化，按照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推进产权清晰化。这些年为了能够公正地对待不同理论派别，我对学界各派人士一向“以师礼事之”，一概尊为“老师”，对各种观点一视同仁，采取“拿来主义”。在理论界讨论问题的很多场合，我都刻意地强调自己只是个“试验员”，而绝非理论工作者；现在，也坚持认为自己提出的只是对农村基层客观情况的感性认识。

^① 参见本书第一版序言。



正因为我实在不敢妄称经济学家，也约略知道中国学术界现在对我的宽容很可能只是暂时的，因此，这些年便在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有时遇到严厉的批评，哪怕批评者过于激进、不够理性，我也会反复道歉到人家满意。总之，先接受下来；绝不反驳。

当年我带着这本书第一版在很多国内外大学和地方机构作了演讲，几乎每次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很多朋友提出质疑和问题，也认为过去很多约定俗成的观点受到了重大挑战。可以说，是社会大众，包括国内大多数干部和青年学生对我书中观点的普遍接受，给了我再版的信心。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依据这些乡土试验提出的研究项目建议书，近年来连续获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还得到国家985中国农村发展创新基地（I类）项目的资助。我想，也许是国家的各种变化，使得我的这些草根研究逐渐登入大雅之堂！

这也是我答应再版之后竟然修改了2年的原因之所在。

过去读者问我本书的重点时，我会直言不讳地劝告他千万别读第一部分，因为那些理论之中的大部分是对付在研究生院做论文的需要而搬用的。可本书再版之际则不同，我会劝读者重点看第一部分。因为我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经对第一版书的第一部分提出的理论假设和环境条件的描述，乃至案例的分析，都做了重要修改。

以过去第一版强调过的工业化从农业提取原始积累的历史进程分析为基础，再版时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包括5个要点的假说体系：

……其一，是一个不同于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在一定的资源禀赋约束下推进国家工业化导致的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二，则是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而提出的创新，即：不同条件下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方式和过程，导致不同的制度路径，并对其后的制度变迁构成“路径依赖”。其三，提出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的有效性的评价原则。其四，指出“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成本。其五，认识到制度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称的。

我还把尚未完成讨论的、不成熟的论点——关于西方经济学中与小农经济相关的两种假说：恰亚诺夫“生存小农”/舒尔茨“理性小农”的对比分析——纳入本书的第一部分导论。

由于当年在国内农经学者之中能够结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来讨论农村

制度变迁的著作很少见到，本书的理论观点也初步构成了具有逻辑解释力的假说体系，因此，第二版对第一部分所作的分析解释也会有较大修改。

其中，本书第一版表述的作者过去一贯坚持的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观点内涵，也在第二版时有重大调整。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我在书中的自我批评：

尽管这是我们自80年代中期全国完成大包干改革以来一直强调的；但近年来的调查研究和国际比较，已经使我不得不深刻反省以往的庸俗化、简单化讨论中的很多问题。

此外，第二版删除了第一版原第十章关于农村经济主体的大部分内容，选择有价值的分析插入其他章节。这样，原第十一章成为第十章，重点讨论税费分配与地方治理，亦即，农村中大量发生的社会冲突本质上是百年国家政治建设进程中长期未能解决的包括村治、乡治和县治的“三治问题”，或者说，是如何低成本地构建适应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的农村上层建筑的问题。这是最近5年研究颇有斩获的新领域。

所谓“十年磨一剑”，从1996年发表以“三农”问题为标题的文章至今整整过去12年了，我但愿集12年研究精华于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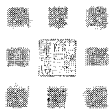
.....

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朋友理解这本书的与众不同，我在第二版序言中特意把当年的获奖论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① 改写为第二版序言正文。之所以称之为引述^②，是因为，那篇论文本来就是这本书的摘要，论文题目本来也与这本书的副标题完全一致^③。读了这篇序言，可以使读者大体了解我写书时的背景和思路。

① 此文在2000年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长江读书奖”评选中获得优秀文章一等奖。

② 这次引述时，改写的内容会用不同字体“楷体”标出。

③ 本书副标题为“‘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而论文发表时这个题目被编辑改为《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引述：《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1999年发表的旧文)^①

……本书中的观点主要来自于我在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11年实践。我不仅有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试验区”创办时起就参与其中、一直干了11年；而且，最近这些年不能再从事原来的试验区工作之后，又不期然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机会：

一是可以安静地坐下来、总结试验成果；可以认真地读点书，可以“学然后知不足”，可以进一步反思自提出“三农”问题以来、不断在理论见之于实践的过程中得以深化的认识。有方法论常识的人都知道，“试验”就是通过不断地试错和证伪来科学求解，因此即使大部分试验出了问题或不能成功，本来也应该是符合预期的正常现象，不必动辄得咎。

二是可以利用参加国际会议，或被聘任为NGO项目咨询顾问的机会，去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入乡村做考察，甚至得到机会去那些拉美或南亚的大型贫民窟和游击队控制的贫困农村地区做实地调研；还可以更多地和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NGO的基层工作者交流，学习那里的人们的真知灼见。

有了那些国内外的调研、学习和反思，才有本书阐述的不同于一般的观点。

一、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长期在基层的摸爬滚打之中，我有过很多被书本上的理论迷惑、又被大量的实际调研所解惑的经验，于是才逐渐不惑。认为中国近一个世

^① 这是我写第一版《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这本书的摘要，也是我斗胆发给《读书》这样被我看作“阳春白雪”式的刊物的第一篇稿子；此前，我这种长期埋头草根试验的人根本就不敢投稿；此后，也完全没想到第一次发表就被评了优秀文章奖。文章原载于《读书》1999年第12期，现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Inter-Asia Culture Studies》(2001, 3)。

纪以来受西学影响逐渐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一直就有一个源于西方的科学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如何与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先后居于绝对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客观上也同样有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无论是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国内外认真治学的学者，都认为这个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好。因为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农民国家。中国20世纪前50年的3次国内战争，被称为3次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解放后50年的重大制度改变也发起于农村：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从满足农民要求的土改起；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农民的合作化起；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又从农民自发的大包干开始……弄得无论什么外来思想、内生理论，都不得不在能否解释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上受检验。

有鉴于此，对于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问题研究，我能够提出研究农村制度问题的前提性基本假设，其实是一个简单到尽人皆知的历史性判断：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从这个假设出发进行的研究可以抽象为“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史阶段”，这10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民国家的4次工业化”^①；通过研究得出的结果更是十分简单：“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

以下是我对于假设做出的解释：

1. 中国近代农村革命的基本脉络

孙中山早在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初，就以历代农民造反提出的要求——“平均地权”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立即引起了与保皇派关于农村土地占有关系问题的论战。尽管孙中山及其同志在理论上没有退让，但是不久之后他却在自身革命实践中得到教训——农民几乎不为革命所动。他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平等其实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于是，发动不起农民革命的孙中山转向联络“会党”起义，那场革命最终沦为列强操纵下军阀崛起的割据战争。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20年代做农村调查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① 参见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版。



告”充分肯定了被大多数人所诟病的“痞子运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依据。后来在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历程中，也一度尝试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来平均地权；其后不久他就因为山区小农剩余太少、不足养军，而把土地革命改变为“斗土豪、筹粮饷”，并因此而受到“左倾路线”把持的中央的严厉处分，险些为此牺牲生命。此后，井冈山和其他根据地也因此虽然“扩红”30万而“苏维埃”革命终于未果。再后来红军历经艰苦长征，几次选择目的地才发现陕北；而仅以3万军力在陕北贫瘠的乡村立足，以“延安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战胜了王明从莫斯科照搬的苏式教条主义并终成正果，究其内在原因（排除抗日战争这个外因），把“分田地”改革为“减租减息”，把“打土豪”改革为以“三三制”来保持农村基层传统的社区精英自治以降低乡村治理成本，应是其中的关键。《毛泽东选集》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草根派的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国际苏式教条主义斗争的产物。

2. 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与政府追求现代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几乎就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从教训中逐步纠正从西方的共产国际批发来的左倾错误的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30年代也曾经有过一次较深刻的反思。一批注意研究国情问题的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称“亚细亚形态问题”引起讨论。其意在于引证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5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这本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是一线希望的曙光。

因为，东方古国以原始灌溉农业为生存基础，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求以“群体（家庭/社区）”为社会基因，其社会发展过程因此的确有别于以原始狩猎、采集和畜牧为生存基础、以“个体”为社会基因的西方。我之所以持此观念，还因为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在汇集了人类文化遗产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认真地做过观察对比。人类从原始氏族共有制社会向古代国家的社会进化历程，东西方差别十分明显。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结构的社会：西方在采集、狩猎这种“索取性”的生产方式制约下个体的强壮和能力是索取多少的前提，因此必然突出个体，也就形成以个体为基因的社会。东方尤其是至今还没

有被西方完全殖民化过的中国，则是在原始农业部落沿河引水、开发灌溉农业所要求的共同劳动中，形成了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完全不同于西方“索取性”生产的“积贮防灾”的积累方式。

这种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确有决定作用——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治形态“夏朝”，产生于“夏禹”联合并带领沿黄诸多农业氏族公社对黄河水害的成功治理，而非阶级压迫和战争掠夺；黄河流域当然也就不会有类似西方的奴隶制国家。马克思晚年在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的自省之中提及的“亚细亚形态”，也就得以成立。

我们在世界史中可以看到，古代灌溉农业社会“积贮防灾”的积累方式形成的财富，对“索取性”的地中海文明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且在距离上越近，就越容易被征服：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领土相继被西方征服、其群体文化也逐渐地被改变；尽管这种被迫改变的历史至今未能完成并且充满灾难。诚如马克思所指，中国之所以幸免于难，不仅由于距离上远，而且西、南两面有戈壁荒漠、高原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东、北两面有太平洋和严寒的西伯利亚冻土带——这是中国在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之前未被征服的主要原因。

应该注意的是30年代那次关于“亚细亚形态”讨论的结果：随着这批强调中国国情的学者被打成“托派”，学术界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深入讨论也因之中辍；而曾经在理论界起过重大作用的《奴隶制时代》，由于明确了中国也与西方完全一样，存在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5段论进化模式而备受赞赏^①。当然，其实际上对于近代历史发挥的作用非常重大——使得在延安山沟里的毛式马克思主义能够被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者大致认同。

同理，有些经济学家后来的执牛耳，当与他们在农村调查中认定“不足10%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这样的重大判断、从而为大规模土改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关。对此，本书的第二部分有所分析。

为了搞清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我还专门安排了对100多

^① 当年论证中国与西方在社会进化上完全一致的学者代表是郭沫若，以诗文著称于世的他解放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